明史的研究是一个好的参照，有助于说明一个强大创造力与扎实基础的学者对于学术开拓的巨大作用，正如陈寅恪在唐史研究中所承担的那样。只不过，明代史领域的研究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反例而不是模范提出，唯一值得提及的，是黄仁宇的影响，其《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无疑在明史研究中具有相当的分量，但由于黄仁宇后来兴趣的转变等原因，使其终于未能在学术界获得更多的成就。有关明代历史的种种，至少在本书出版之时（1988年），很多方面还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记叙或历史史实的发掘，对历史现象、社会问题深入的分析还没能够得到充分的开展。可能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明史研究里程碑式的突破仍未出现，无论中外学界。

本卷作为记叙体，政治史的维度要胜过经济史、社会史的内容，思想史则基本不涉及。明代政治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不受限制的皇权，以及畸形的官僚体制。明代政治架构的雏形为朱元璋所构造，但在其身后，建文帝时期的大臣或许有心对此做出修改，但无论他们的设想如何，由于朱棣的篡位都不可能得以实现。朱棣大概是出于对皇位合法性的不安，加上本人更热衷于军事而不是政治的设计，在永乐一朝不仅扭转了建文时期对洪武政治的调整，反而进一步将朱元璋所设计的诸项政策加以僵化。如此说来，朱棣一朝则不得不被视作明代政治的基本定型时期。在其之后的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统治的十年（1425-1435），虽被后代的史家当作明代的黄金时代，但有两点令“仁宣之治”的光辉有所失色：一是时间的短暂，可于共和国的那十年相比较；二是仁宣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朱元璋、朱棣的那一套带有根本缺陷政治架构，以及调整在经济、军事上的保守消极政策，在官员面前，围绕着皇帝的不平衡的巨大权力，必然会在某个时候产生严重的后果。这后果来得极快，就在朱瞻基之子朱祁镇幼年登位而不能充分行使皇帝的权威时，太监王振实际上于皇太后离世后通过引导皇帝而控制了朝局。实际上没有任何制度性的措施可以使得外廷的大臣约束皇帝实践其想法，在王振的鼓吹下，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差点令明朝重演靖康之耻。

在正统、景泰之后的明宪宗和明孝宗时期，两位皇帝都被本书称为能够与朝廷充分合作的人物，本书也进一步认为这一时期（1465-1505）皇权的专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如果考虑到正是在这一时期，宦官的权势得到了显著的增长，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宦官也在朝政中扮演着愈发突出的作用，上述的印象也需要得到修正。尤其考虑到宦官只能依附于皇权，而无独立的权威时，皇权专制似乎并没有在这一时期有所消减，只不过由皇帝转为宦官来行使。

这种政治制度上的根本缺陷贯穿了明朝的整个历史，以至于被认为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也没有对财政制度、行政机构做出任何结构性的改革。张居正虽然以宰相自居，但凭借的是其在朝廷的关系网络与个人的权威，无关乎任何具体的职位，包括内阁首辅。而且相较于唐宋的诸位权相来说，张居正的相位实际上要脆弱、无力得多。

明代政府内在的结构性问题无疑是理解明代政治的关键，但本书只能停留在历史现象的叙述上，没能够做进一步的分析。希望在剑桥明代史的下卷会有所突破。